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最终成果

项目名称：抵制日货运动的历史困境（1908-1945）

成果名称：抵制日货运动的历史困境（1908-1945）

项目编号：08XZS012

项目类别：青年项目

学科分类：中国历史

2012年5月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最终成果

项目名称：抵制日货运动的历史困境（1908-1945）

成果名称：抵制日货运动的历史困境（1908-1945）

项目编号：08XZS012

项目类别：青年项目

学科分类：中国历史

2012 年 5 月

摘 要

抵制日货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重要形式和内容,频率之高,史上罕见。全面系统研究抵制日货运动的历史困境,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抵货运动这一重大历史问题本身的认识,也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近代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从而拓展和深化中国近代史研究。

该研究在前人基础上,以中日之间国力不均衡的历史背景为审视基点,以民族情感与经济理性的交互作用为逻辑统摄,对1908至1945年历次抵货运动的效果及其困境作了较为详尽和系统的研究。该成果除导论和结论外,包括具有逻辑递进关系的两大部分内容,即抵货运动的效果以及抵货运动的困境。

导论部分在简要回顾前人研究之后,对抵货运动进行了必要的界定,对研究时段的选取理由、立论基础、研究方法、框架结构以及采用资料作了扼要说明。

第一章,理想与现实:抵货运动的效力。根据抵货运动具体目标的差异,将其分为事后报复、外交后盾、制止军事侵略以及经济战争四大类型,并将历次运动的具体目标与最终结果进行对照,从而考察抵货运动目标的实现程度。比对抵货目标与其实际结果之间的差距说明:历次抵货运动的效果相当有限。1937年之前的历次抵货运动,或者基本上无助于“事件”的解决,或者不仅未能阻止日本的军事侵略,反而成为日方扩大侵略的借口。比较明显地发挥了一定政治作用的抵货运动,最多只有1919年和1927年的两次。在抗战时期两国经济战中,中国明显处于劣势,并逼迫废弃经济绝交政策。而抵货运动即使有助于民族经济的发展,但也只是该运动的副产品。个案性考察与长时段审视相结合,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分析抵货运动对日货进口和在华经济势力的具体影响,从而论证抵货这一武器的经济效力。抵货运动的思路在于抵制日本商品或服务,甚至通过中断两国经济联系,从而重创日本经济,以期促使日方答应中国正义要求,或者放弃对华侵略政策。通过计量评估抵货运动给日本经济造成的打击程度,不难发现:抵货运动虽然大多造成日货进口减少,日本在华工商业遭遇困境,但并未能够阻断中日贸易的发展以及日本在华经济势力的扩张。抵货运动绝对没有象抵货舆论所预期的那样,能够在经济上“制日死命”。

抵货运动之所以经济效力有限、政治效果不著,主要在于该运动面临重重困境。第2-7章则逐一分析制约抵货运动效力的诸种困境。

第2章为抵无可抵:抵货运动的经济困境。以抵制日纱、煤、纸以及金融为例,探讨在中日经济联系紧密的背景下,抵制日货给中国工商两业以及民众生活造成的深刻影响。本章的分析和讨论说明:日本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是发动抵货运动的必要条件之一,而两国在原料、燃料、金融、技术、机器等方面的不平等的共生关系,导致抵制日货既暂时缓解部分民族工商业的竞争压力,也给民族经济发展带来麻烦;给普通民众提供了表达民族主义的简易手段,也给民众生活造成诸多不便,因而抵货运动仅能有限抵制而无法全面抵制,亦注定可暂而不可久。

第3章为激进与保守：各界群像及其冲突。在梳理学生、工人、商人参与抵货运动具体方式的基础上，指出群体之间尤其是学生和商人之间激进与保守互见，从而发生口角之争、武力冲突、罢市风波甚至炸弹威胁。而为了继续推进抵货运动，抵货积极分子往往只能降低其力度和烈度。因此，抵货运动内部的群体差异性，不仅极大地制约着抵货运动的经济效力，也往往成为日方外交抗议的口实，同时也是中国历届政府管控甚至取缔抵货运动的理由之一。

第4章为国分南北：抵货运动的地域差异。将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中和华南四大区域，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考察历次抵货运动的地域差异性。显然，即便是全国规模的抵货运动，也不可能形成整齐划一的集体行动，往往是各地抵制行动起讫时间不一，抵制力度大小不等。抵货运动的地域不均衡性，既为日货转移销售渠道提供了契机，也从整体上弱化或抵消了抵货运动的经济效力。

第5章为摩登与爱国：崇洋风尚与抵货运动。借鉴社会学关于时尚问题的理论，从社会崇洋观念的生成与传播入手，揭示抵货运动中民族主义与崇洋观念之间的紧张关系，探讨社会观念对抵货运动经济效力充分发挥的制约。可以说，抵货运动希冀国人将商品国籍作为消费选择的决定因素，并反复质疑日货消费者的爱国精神，以便消解舶来品所代表的社会时尚与消费潮流。但与国货相比，日货不仅在价格和质量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且与“时尚/现代”观念之间具有强大关联。民族主义与崇洋观念的博弈交锋，成为抵货运动的基本面相之一。前者是抵货运动赖以勃兴和推进的思想性资源，而后者则往往成为抵制运动经济效力充分彰显的观念性障碍。

第6章为强势应对：日本朝野与中国抵货运动。分别梳理了日本政府和民众对中国抵货运动的种种因应方式，并对日本朝野的上一致和彼此互动进行了细致讨论。研究表明，国人试图通过抵制日货而动摇日本侵略者的经济根基，而日本朝野则上一致，采用外交、经济、军事等诸种手段强势应对，努力消弭中国抵货运动。促进日本民众反省，并起来反对其政府的侵华政策，这本是抵货运动的初衷，但日本民众的种种强硬诉求，反而成为日本政府强硬施压中国政府的社会基础。日方的反抵制构成中国政府限制和取缔抵货运动的强大外部压力。在中日国力对比悬殊的博弈交锋中，日方的强势应对成为抵货运动无法跨越的历史障碍。

最后一章为国权与私利：党政力量与抵货兴衰。主旨在于考察中国政府与抵货运动兴衰之间的历史关联。该研究不赞成将镇压和破坏作为历届政府对待抵货运动唯一反应的观点，而是将政府策略的选取置于一个动态的而非静态的过程中进行考察和诠释。在引入日方压力、社会秩序和在野势力等各种变量之后，试图对中国政府对待抵货运动的策略给予同情和理解。研究结果显示，晚清以降各届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虽然强弱有别，但至少可以主导抵货运动的方向和轨迹。绝大多数抵货运动的兴衰起伏，与政府态度密切相关。历届政府对待抵货运动的立场虽然不尽相同，但基本上经历了从默许到打压的变化过程。政府在如何因应民众抵货运动时，既要顺应国人的民族情感，又要防止社会秩序因此而失控；既想以此作为

抵御外侮的重要工具，又不能不考量国际关系由此而进一步恶化的问题；在野政治势力的动员，既是抵货运动勃兴的重要组织性力量，也是执政者管控和取缔抵货运动的重要因由。抗战时期，官方主导了中国的经济绝交运动，但是，严禁与违禁的悖论性特征极其明显，尤其是地方当局敷衍塞责，谋私甚至走私，极大地削弱了中国经济战的效力。

要之，抵制日货运动虽为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史不可漠视的一环，但显系近代中国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等都无法抗衡日本强权之下的次优选择，既非救国利器，亦非强国之道。

目 录

摘 要	I
导 论	1
一、研究缘起	1
二、研究进展	2
三、概念与时段	6
四、相关说明	8
第一章 理想与现实：抵货运动的效力	11
第一节 抵货运动的目标与结局	11
第二节 抵货运动的经济效力	24
第二章 抵无可抵：抵货运动的经济困境	61
第一节 抵制日纱与布业困境	61
第二节 抵制日煤酿成煤荒	67
第三节 抵制日本纸张与新闻出版困境	71
第四节 抵制日本在华金融	80
第五节 抵制日货与民众生活困境	82
第六节 有限抵制	91
第三章 激进与保守：各界群像及其冲突	105
第一节 激进与保守之分野	105
第二节 群体冲突及其结局	117
第四章 国分南北：抵货运动的地域差异	127
第一节 抵货运动的地域差异	127
第二节 地域差异为日货转销提供契机	140
第三节 地域差异削弱抵货运动经济效力	143
第五章 摩登与爱国：崇洋风尚与抵货运动	147
第一节 社会分层与崇洋风尚	147
第二节 崇洋风尚的传播路径	150
第三节 崇洋风尚对抵货运动的阻滞	153
第六章 强势应对：日本朝野与中国抵货运动	166
第一节 日本政府的应对方式	166
第二节 日本民众的因应之道	174
第三节 日本朝野一致与官民互动	187
第七章 国权与私利：党政力量与抵货兴衰	203
第一节 抗争与妥协：日方压力与抵货运动	203
第二节 失控与管控：抵货运动与社会秩序	212
第三节 在朝与在野：国内政局与抵货运动	218

第四节 严禁与违禁：抗战时期官方与经济绝交 224

结 论 232

参考文献 236

图表目录 255

导 论

一、研究缘起

2005年,海内外华人和韩国民众针对日本右翼势力修改教科书、否定甚至美化侵略历史问题,以及日本政府试图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问题,发动了较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3月31日,纽约华人知名团体“美国林则徐基金会”呼吁全球华人共同抵制日货,对日本实施民间“经济制裁”,并得到“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的响应和支持。在国内,深圳、北京等部分城市也出现和平的抵制日货运动。对此,社会各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赞成者有之,否定者亦有之^①。中央则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对民间的抵货运动“降温”。4月22日,时任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就中日经贸关系回答记者提问时强调,民众提出抵制日货,“是想表达对日本一些人否认侵略历史等一系列错误言行的不满”,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生产要素相互交流、按价值规律进行配置,经济发展已逐步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因此,“抵制商品将损害双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不利于我们的对外合作与发展。”同时,中央还派出宣讲团赴全国各地尤其是部分重点大学举行“中日形势报告会”,希望青年学生理性地表达爱国热情。前外交部部长李肇星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日形势报告会”,中央电视台一套在黄金时间中断其他节目进行现场直播。此外,《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新华社等权威媒体刊发大量社论,希望民众珍惜来之不易的稳定局面,一心一意谋发展^②。

2010年钓鱼岛撞船事件发生之后,抵制日货的呼声再次高涨。《民间对联故事》从中华网粹网转引一文,其中写道:“如果我们中国人一个月不买日本货,日本企业,至少就有1000多个人失业,中国就会有10000多个工人上岗;如果我们半年不买日本货,日本就会有1000多家企业倒闭;如果我们一年不买日本货,日本,就会面临崩溃和瓦解!到那个时候,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还会像今天这样嚣张么?他们会反过来求我们的!”该文编后语呼吁读者“实际行动抵制日货”^③。

尽管当下的抵制日货运动并不多见,但抵制日货的呼声与讨论则充斥于网络空间,甚至不少人将网络视为狭隘民族主义的摇篮。譬如,“抵制日货同盟”的网站上写着:“如果中国人1个月不买日货,日本将有数千家企业面临破产。如果中国人6个月不买日货,日本将有一半人失业。如果中国人1年不买日货,日本经济结构彻底瓦解,日本还能这样嚣张吗?你如果是中国人,不用你上战场当炮灰,你要做的事很简单,就是不买日货,我们没有时间

^① 譬如,茅于軾从经济理性人的经济学基本预设出发,认为“抵制日货是很愚蠢的办法。”因为“我们活在世上到底为什么?其实我的答案很简单,就是为了享受人生。”而抵制日货妨碍了这一点,因此很愚蠢。(参见《南方都市报》2005年11月6日)而《中国青年报》曾经刊文批驳茅于軾的看法。(参见《享乐:抵制日货愚蠢的惊人理由》,2005年11月10日)

^② 参见《中央给民间“抵制日货行动”降温》,《开放潮》2005年第5期。此次抵货运动曾经引起西方高度关注,譬如 Chinese call to boycott Japan (All-Round Country, Section: World,p.10)。目前仅见的深入研究是 Shih-Diing LIU.China's popular nationalism on the internet, Report on the 2005 anti-Japan network struggles,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Volume 7, Number 1, 2006.

^③ 《行动起来抵制日货》,《民间对联故事:下半月》,2010年第10期。

和权力去采取政治行动,我们只能作力所能及的事,拒买日货是我们对付日本人的最好行动,不但简单而且有效,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来和我和许多爱国人士一起并肩战斗吧。”^①

对于研习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来说,上述言论是如此的熟悉,不能不立即想起黑格尔的名言,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②。上述情景在近代中国曾经反复出现,并且不仅仅是一种呼声,而多演化成为实实在在的历史行动。与当今虚拟空间的民众诉求相比较,近代的抵制外货运动更加频繁,规模更大,影响也更为深远,成为中国近代史尤其是民众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之一。尽管当下中国的社会性质与清末民国完全不同,国际地位亦判然有别,但按照年鉴学派一代宗师布洛赫的说法,“古今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③换言之,由古知今,由今知故,古今互证,方能相得益彰。因此,尽管历史研究的本质在于求真,但是适度的现实关怀亦为势所必然。由抵制日货的现实关照触发对抵制日货运动史的学术关注,经由抵制日货运动史之研究而寻求理解当下抵制日货问题的历史智慧,这正是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致与最终依归。

二、研究进展

近代中国的抵制洋货运动至少可以追溯至鸦片战争前后^④,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是我

^① <http://q.163.com/ligen/>

^② 不妨进行简单比较:《初中生优秀作文》2006年8期曾经刊有《从“抵制日货”谈起》一文,《中华散文(学语文)》2009年第1期刊有《抵制日货》的文章,均为中学生所作。无独有偶,抵制日货也是民国时期学生刊物的重要内容之一,譬如,1924年第3期的《学生文艺丛刊》刊载《救济日灾与抵制日货》;1931年第83期的《无锡童报》有《朋友们的热血:对于抵制日货切实的几条办法》,第86期的“小朋友园地”有《对于抵制日货切实的几条办法》。1931年第19期的《小学生》在“小学生作文”栏目中刊载《抵制日货必先提国货》,第20期刊有《抵制日货最有效的方法》。

^③ [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36页。

^④ 1831年春,广州附近居民对洋纱进口“曾发生很严重的骚乱”,因为洋纱剥夺了他们家中原来从事于纺纱的妇女和儿童的生计,大家决定不用洋纱。黄浦东北的居民在各乡镇便贴标语,提出警告,凡在广州购纱入乡者,一经抓获,立即处死,以致洋纱生意停顿。1849年,为反对英国侵略者入城,广州粤省锦联堂号召抵制英货,“暂停与夷人交易。所有入口匹头,不准私买,即夷船开投零星货物,亦不准往投。”并列6项条款,要求本行业各店“不得买受夷人货物;不得与洋行丝毡店及买办买受货物;不得到夷馆投受货物;不得与外行并客商买受夷人匹头货物;不得假手别行客店,转受夷人货物,不得与丝毡店私相授受。”以上六款,列在必行,各宜凛遵!如有胆徇私违例者,众议罚银四百两;知情报信者,公所谢花红银二百两;如该店伙伴,知情不报,本行永不雇用。”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2),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09-510页。

同时,抵制外货也并未中国独有的历史现象。1915年5月10日的《神州日报》曾经载文《排货之研究》。作者认为,所谓排货,质言之,“即个人或团体排斥某货不用之谓也”。排货动机有二,其一为“物的关系而排斥之”,如排斥有害、不良之货;其二为“人的关系而排斥之”,如排斥某地方所制造之货、某商店所销售之货。更为宽泛地说来,可谓无时无地不有排货之举,“盖利己者,人之天性”,“夷齐耻食周粟,仲子不饮盗泉”,亦属排货范畴。以此为据,作者认为,“日本之斥外货不用,尤至明之例也”,譬如,日本曾“检出中国之漆,和有他物,则举而焚弃之,且令漆商不再购运”;日本检验华棉,“遇有不合者,皆排斥不用”。美国曾“检出日本之茶,掺有染料,则勒令运回,不许在美登岸销售”。尤为典型的例证是,1908年“土人因奥吞并波赫二州,组织团体,以排奥货。奥船至土国口岸,竟无一人为之运卸,奥人窘迫之余,无已而向土质问。土国答言,谓商民不愿购货,乃商民之自由,政府不能负其责任,……奥终无以(为)难。”(此引转见《东方杂志》,1915年第12卷第5号(内外时报),第16-17页。)

再如,1924年,美国颁布法令,禁止日本人移入美国,从而引发日本抵制美国好莱坞电影的运动。参见 Yuko Itatsu. Japan's Hollywood Boycott Movement of 1924, Historical Journal of Film, Radio and Television Vol. 28, No. 3, August 2008, pp. 353 - 369. Stalker. Nancy. Suicide, Boycott and Embracing Tagore: the Japanese Popular Response to the 1924 US Immigration Exclusion Law, Japanese Studies,

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抵制洋货运动。自此以后，抵货运动相继不断。而随着日本侵华步伐的不断推进，抵制日货成为抵制洋货运动的主体。1908年，二辰丸案引发中国民众的首次抵制日货运动，次年又因安奉铁路改筑事件引起中国抵制日货。此后，1915年的“二十一条”问题、1919年的山东问题、1923年的收回旅顺和大连问题，1925年的沪案问题、1927至1928年日本出兵山东以及制造济南惨案、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次年的一二八事变、1932年下半年至1934年日本对华北的一系列侵略事件，都引发了中国规模不等的抵制日货运动，即使是在全面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仍未放弃抵制日货这一武器。可以说，抵制日货运动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重要形式和内容，频率之高，史上罕见^①。

应当说，对于抵制日货问题，海内外诸多前辈先贤已经进行了极富意义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撇开近人介乎宣传动员与学术研究之间的诸多文献而不论，1949年以来涉及清末和民元以降中国史的大多数研究成果，均不同程度地涉及抵制日货问题。举凡抵制日货运动发生的原因、经过、影响，均有或多或少的讨论。综观国内外已有成果，显然存在两大特点或者不足。一是伴生性研究较多，专题性研究较少。涉及抵制日货问题的成果成百上千，但专题性的研究专著，目前仅见雷麦的《中国抵货运动研究》和菊池贵晴的《中国民族运动の基本构造》两书，专题性的研究论文虽然较多，亦不过50篇左右^②。二是个案性研究较多，系统性研究较少。历次抵制日货运动均有不同程度地研究，但历时性的研究成果，除了前及雷麦和菊池贵晴的两部著作之外，目前仅见1篇博士学位论文。不过必须指出的是，雷麦一书的主旨在于抵货运动的经济效果，尤其着力于抵货运动对于中日贸易的影响，并非中国抵货运动的全面性研究。而且，因为该书初版于1933年，其考察时段止于1932年，对1909年抵货运动则未有涉及。菊池贵晴一书从民族主义视角立论，对历次抵货运动的过程和影响考察甚详，亦止于1932年。2009年，吴志国所撰博士学位论文《近代中国抵制洋货

2006, Vol. 26, Issue2, p. 153-170.

另外，在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日货曾经遭到诸多国家的抵制（可以参见《美国抵制日货》，《银行周报》1933年第37期；《日货倾销与世界抵制》，《四川经济月刊》1934年，第1卷第6期；《加拿大与埃及之抵制日货》，《申报月刊》1935年第8期；《秘鲁抵制日货》，《银行周报》1935年第37期；《澳抵制日货》，《竞存月刊》1936年第2期；《澳洲抵制日货》，《银行周报》1936年第21期；董家溇：《我国及欧美各国抵制倾销述略》，《商学期刊》1937年第1期；《抵制日丝之经济学》，《中外经济拔萃》1937年第12期；《印度与澳洲相继抵制日本丝》，《银行周报》1936年第17期；《日本抵制澳洲羊毛》，《银行周报》1936年第42期；《中南美各国抵制日布》，《银行周报》1935年第44期；《各国抵制日本毛织品倾销》，《银行周报》1934年第46期，等），此类抵制行为，与中国抵制日货运动截然不同，乃是针对日本倾销政策的经济手段。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抗战初期，欧美民众亦掀起抵制日货运动。此举乃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援华制日的重要内容，相关研究可参阅韩永利、方长明《论抗战初期英美民众援华制日运动》（《民国档案》2009年第1期）、方长明《中国抗战初期美国教师阶层的援华运动》（《理论月刊》2009年第1期）、方长明、王莹《论中国抗战初期美国民众抵制日货与终止对日贸易运》（《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王霄飞《试述美国历史上的两次抵制日货运动》（《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4期）等论文，以及沈庆林《中国抗战时期的国际援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相关章节。

^① 有学者认为，自1908至1937年的30年间，中国共发生9次抵货运动，运动延续的平均时间为每次7个月。如果将所有抵货运动的时间相加，则超过6年半，相当于30年内平均两年半发生1次，频率非常高。参见近代上海日资工业史，271。尽管在统计抵货运动的次数问题时有分歧（例如，1919至1922年的抵货运动，究竟视为1次还是3次），但运动之频繁则是毫无疑问的。

^② 本课题研究对相关成果多有借鉴和评介，所附参考文献亦有详列，此处不予赘引。另，关于抵货运动研究状况较为细致的梳理，可参阅吴志国：《近代中国抵货运动研究综述》，章开沅、严昌洪主编：《近代史学刊》第5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3-143页。（本文系其博士学位论文的部分内容）

运动研究（1905-1937）》，系目前关于抵货运动史的较为详尽的成果。

不少学者对抵货运动与民族经济发展之间的历史关联进行了充分评估。大体而言，既有成果或微观或宏观，从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市场压力、利润水平、投资机会以及民众的消费意识等各种视角，分析了抵货运动对近代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①。但是，大多抵货运动的肯定论者，亦不得不承认此种作用的有限性和暂时性^②，同时，此种促进作用不仅难以精确估量，

^① 早在1933年，即有西人指出，抵货运动不仅给日本的对华贸易造成损失，而且充当了中国工业化的刺激物，从而造就了日本工业永久性的竞争者。抵货运动导致日货来源中断，许多中国工业于是得以创建。阳伞、火柴、电器、搪瓷、橡胶鞋、纸、编织物以及棉纺织这些行业，都是在抵货期间创建或发展的。许多抵货组织实际上一直在筹措资金，发展工业以取代日货。（John E. Orchard,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JAPAN'S ASIATIC POLICY, Foreign Affairs, Vol.12, No.1, 1933.82）建国以来，几乎所有成果都肯定抵货运动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如赵亲指出，1915年抵制日货运动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此次运动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开辟了国货的销售市场，缩小了日货的销售市场，活跃了国内市场，随着中国国货销售市场的扩大，中国资产阶级的利润也日益增加。（《1915年抵制日货运动》，《复旦》，1959年第8期）；周青山认为，五四抵货运动推进了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抵货运动不仅促进了国货的畅销，且调动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加速了社会扩厂和建厂之风，使整个国民经济得到一定发展。（《五四“抵货”运动初探》，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董振平则强调五四时期山东抵制日货运动对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①。张耀民和李德芳强调五卅抵货运动在经济方面的积极作用，前者认为，1925年抵货运动与中国国际贸易及民族工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某些条件。（《1925年上海抵货运动的得失》，《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8年第5期）后者强调，1925年遍及全国的抵制仇货运动暂时阻止了一战以后帝国主义向我国倾销商品的浪潮，动摇了帝国主义对我国市场的垄断地位，民族工业的境况得到一定改善，一度形成了20年代我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高峰。（《略论五卅运动对我国民族工业的影响》，《历史教学》，1988年11期）黄逸峰强调，抵制外货和提倡国货的群众运动系近代中国人民历次反帝爱国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民族资本主义能够获得某些发展的动力之一，抵制日货和提倡国货都直接刺激了民族工业的发展。（黄逸峰：《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年版，第413-419页）王相钦认为，中国近代国内市场上的抵制洋货和提倡国货运动，对提高民族爱国热情、抵制洋货的倾销和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抵制洋货和提倡国货——中国近代市场上的反帝爱国斗争》，《商业经济研究》，1995年第7期）严国海则强调指出，20世纪20、30年代民族企业的发展，最重要的原因是宏观环境因素发生了变化，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民众掀起的一系列抵制外货的爱国斗争为民族企业走出困境、获得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市场机遇，创造了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②（《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民族企业发展的宏观环境》，《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张仲礼和李湘两人有多遍论文讨论抵货运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历史关联。辛亥革命前后历次抵货运动起了保护民族工业和促进民族工业获得一定发展的作用。20世纪的抵货运动猛烈地打击了外国商品以及在华外厂产品的销路，解除了一些民族工业所受到的压力，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非常突出”，五四时期抵制日货运动对民族工业发展的促进作用较大，并且认为五四时期民族工业的“黄金时期”与抵货运动密切相关。

（张仲礼、李湘：《五四时期中国人民抵制外货运动与民族工业的发展》，《社会科学》1979年第2期；李湘、张仲礼：《1905-1937年中国人民抵货运动棉纺织品市场的影响》，《商业研究》，1963年第3期；《辛亥革命前后中国人民的抵货运动》，《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张仲礼：《五卅时期抵货斗争与民族工业的发展》，《档案与历史》，1985年第1期），等等。另外，日本学者 Shibata 与 Harumi Goto 合著的《Japan, China and the Growth of the Asian International Economy 1850-1949》一书专列一章，讨论1928至1931年中国抵货运动的影响，认为在中日商业竞争背景下，抵货运动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化，在一定程度上说，其作用甚至超过关税，因为抵货运动既针对进口日货，亦将在华日厂产品作为抵制目标。同时指出，英日两国商人对抵货运动的反应便是此种运动在经济方面产生重大作用的直接证据。（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June 2, 2005, 相关论点参见该书第127-145页）美国学者葛凯强调，抵货运动的重要性不在于它给贸易带来的短期经济影响，而在于它在形成民族主义意识的特殊形态中所起的作用，这种意识是以消费“中国”产品以及不消费“外国”产品为中心的。与此同时，抵制活动期间舶来品的缺乏也为国内制造商提供了经济机会。（《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黄振萍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5页。）

^② 譬如，李宜群指出，“不论是全国性的或地区性的，每次抵货运动都或多或少对被抵制国的经济造成一定打击，对国家、地区民族纺织业的产生、发展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但尽管如此，抵货运动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对近代经济及纺织工业发展的作用是有限的。”（李宜群：《近代中国的抵制外国纺织品运动》，《中国近代纺织史研究资料汇编》（16），1992年版）张仲礼强调，“抵货运动虽然获得了一定的政治、经济效果，但毕竟不可能使帝国主义放弃殖民统治，不能解除民族工业所受的束缚。”“必须充分肯定抵货斗争是其重要因素之一。但是旧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受三大敌人的严重压迫与束缚，不可能获得充分的独立发展。五卅运动时期的抵货斗争虽然在这一阶段中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但由于整个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民族资本的命运也就无法改变。特别是进入30年代之后，由于受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趋向恶化的影响，中国民族资本逐步陷入捉襟见肘、罗掘俱穷的境地。”（《辛亥革命前后中国人民的抵货运动》，《社会

甚至存在相互矛盾的说法^①。而即使是与日本在华经济势力处于“外向竞争”关系的民族企业，也并非完全是此消彼长的简单格局^②。

再进而言之，纵然抵货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促进了中国民族经济的出现和发展，但这也只是抵货运动的副产品而已。一般而言，国货运动的性质显然属于经济民族主义的范畴，而抵货运动则否。后者虽与国货运动关系密切，并且往往交叉叠合，但它主要是获致政治目标的手段。虽然不少国货团体是抵货运动的积极推动者，部分商人也出于自身行业发展的需要而积极介入抵货运动，但绝对不能掩盖抵货运动的政治民族主义性质。换言之，与其将抵货运动视为经济民族主义，不如将其视为政治民族主义更加恰当。因此，评价抵货运动成败的标准应该是政治而非经济。如果基于此种视角对历次抵货运动的结局进行审视，毫无疑问，每次运动所宣称的目标与实际效果总是相距甚远，甚至完全落空。

抵货运动这一经济武器的政治效果为何相当有限？较早的研究成果多将抵货武器未能充分发挥效力的原因归结为两大因素，一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历届反动政权对于抵货运动的镇压，二是部分商人或者说奸商的破坏^③。但是，中国历届政权对抵货运动的态度完全一致吗？难道历届政权果真衰弱到无力控制民众运动的程度？为何在运动前期要顺应民意而后期则予以取缔？奸商为何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买卖日货？如果全体国民不愿购买日货，那么奸商又如何能够销售日货？难道部分商人抵货意愿不高则足以影响抵货全局？对于此类问题，上述研究取向似乎缺乏足够和合理的细致解释。

科学》，1981年第5期；《五卅时期抵货斗争与民族工业的发展》，《档案与历史》，1985年第1期）冯筱才则将民族工商业划分为“外向竞争”和“外向合作”两大理想类型，前者如纱厂、糖厂、卷烟厂、火柴厂和面粉厂、运输业等，一般均可从抵货运动中获利，而后者如洋广货业、转运业、出口业以及与外人有关的西服业、西点业等，则往往会因为运动而遭受直接损失^④。（冯筱才：《在商言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229页）。高家龙的研究表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从抵货运动中有所获益，但并不能解决其发展的真正问题。在抵制美货和英货期间，一些小型国货烟草公司出现，但运动结束后多半倒闭^⑤。（[美]高加龙：《中国大企业——烟草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樊书华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甚至1928年抵货期间，上海华商烟厂竟然比1927年减少88家^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313页）

^① 葛凯既认为抵货运动给民族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同时又强调抵货运动给国货公司造成的困境。（参见《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一书相关章节，黄振萍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另外，各种海关报告中不乏对立性的观察和结论，譬如，1922至1931年的厦门海关十年报告指出，“经常发生的抵制运动虽然给贸易造成暂时的混乱，但总的说来，却刺激了中国工业生产的发展，并在一切可能的领域里，强化了以国产货代替进口货这样一个一般趋势。”（厦门市志编纂委员会：《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厦门鹭江出版社1990年版，第387页）而同期的上海海关十年报告即认为，“十年来一个可喜的现象是上海和其他各埠对于国货的需要、尤其是对那些可与进口货竞争的国货的需要已日益增长。这在多大程度上是由进口税率提高和银价下跌造成进口货价高昂所致，在多大程度上又是由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所致，目前还难以估计。”（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252页）

^② 本文相关章节对纺织业和航运业的考察即可证明。

^③ 这一类观察极为普遍，在此仅举数例。赵亲认为，“资产阶级上层和买办阶级，由于他们中的许多人与日本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是依附于日本帝国主义生存和发展，因此，他们中的多数人对于抵制日货采取了消极的态度，有些人还进行了破坏的活动。”“在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的统治下，中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所要求的“文明”抵制日货和提倡国货，都被认为是非法的，遭到了军阀的残酷镇压。”（《1915年抵制日货运动》，《复旦》，1959年第8期）李学智指出，天津商人在五四罢市和抵制日货运动中的表现，“明显而充分地暴露出天津商业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软弱性、妥协性，缺乏政治上的远见和牺牲精神，唯恐人民运动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危及自身的经济利益，在罢市和抵制日货的过程中一味地拖延、敷衍、妥协、退让，影响了天津人民反帝斗争更有力地开展。极少数奸商唯利是图，混尽天良，欲乘国难之机牟取暴利，则扮演了可耻的角色。”（《五四运动中天津商人罢市、抵制日货问题考察》，《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近来不少硕士论文仍然沿袭上述看法。

相对晚近,部分学者开始引入经济学和社会学有关集体行动方面的最新成果,强调抵货运动自身的经济困境,亦逐步关注运动内在的一些缺陷,诸如运动成本与收益等问题。尤为重要的是,不少论者已经不再简单地对运动的各种参与力量进行民族主义之臧否,而是尽可能地予以同情性的理解^①。但是,由于相关研究主题比较分散,又多系个案性研究,自然难免挂一漏万之弊。

因此,本课题研究已经具备较好的基础。但勿庸讳言的是,由于专题性研究和系统性研究成果的相对缺乏,对于抵货运动的诸种制约性因素迄今仍然缺乏足够的理解。为了弥补个案性研究和伴生性研究导致的盲人摸象之憾,须对历次抵货运动的历史困境进行长时段的全方面考量,方可真正体悟后发型现代化国家采用抵货作为反抗强权入侵之武器的种种难境,也才能为理解当下时起时伏的抵货运动提供极富价值的历史智慧。

三、概念与时段

1、概念界定

抵货,系“Boycott”的意译,音译为“杯葛”。1935年出版的《新知识辞典》将杯葛解释为与“某个个人、团体或国家断绝一切来往”^②。而据新生命书局1934年出版的《新名词辞典》的解释,抵货,即同盟经济绝交、抵制、排货、非买同盟之意。该词起源于1880年爱尔兰土地制度改革同盟排斥地主杯葛大尉(Captain Boycott)的事件,“现今凡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对对手国的商业团体或个人作经济的抵制或绝交,俱称杯葛,如我国的抵制日货运动,即系杯葛的一种。”^③

抵制日货,从狭义上讲,主要是指抵制日本商品,即所谓“国际间经济杯葛之发生,乃是一种报复的举动,即甲国人民对于乙国之非友谊的行为或侵略行动,起而报复,大家共同联合起来抵制乙国货物,使之不能在国内畅销,致其经济上的死命,促使乙国觉悟。”^④而从广义上言,则抵制对象更加宽泛,即经济绝交。譬如,1923年,上海《总商会月报》曾经刊载《国权回复与经济绝交》一文,认为“既云经济绝交,则不仅禁止购用日货而已,实含有与日人断绝一切社交之意味。既云断绝一切社交,则凡日人在华所营之事业,吾人皆应与彼脱离关系。如不受日本公司雇佣,不登广告于日本新闻,不载货于日本商船,不向日本公司保险,不向日本银行存款,不收受日本纸币,不往日本医院治病均是也。”^⑤经济绝交一词

^① 可以参阅李达嘉:《罪与罚:五四抵制日货运动中学生对商人的强制行为》,台北《新史学》,2003年第14卷第2期;冯筱才:《罢市与抵货运动中的江浙商人:以五四、五卅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3年3期;吴志国:《五四抵货运动中对“奸商”惩罚的行为研究》,《湖北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周石峰:《民众民族主义的双重面相与历史难境:以天津商人与抵制日货为例》,《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吴志国:《近代中国抵制洋货运动研究(1905-1937)》,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刘柏冲:《天津商人与抵制日货运动(1919-1923)》,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2002年。等等。

^② 顾志坚:《新知识辞典》,上海北新书局1935年版,第166页。

^③ 邢墨卿:《新名词辞典》,新生命书局1934年版,第65页。抗战初期,美国学者对经济抵制和经济制裁等概念的内涵进行了区分。参见 Notable Applications of Boycotts, Embargoes and Anctions, Congressional Digest, 1938, Vol. 17, No. 4.

^④ 纬:《杯葛》,《申报月刊》,1932年第1卷第3号。

^⑤ 峙冰:《国权回复与经济绝交》,《上海总商会月报》,1923年第3卷第4期。

虽系 1923 年首次提出，但在此前的多次抵货运动期间，时人早已提出类似措施，只是未采用“经济绝交”这一名称，不过囿于客观条件限制而集中于不购美货和抵制日货等。该新名词无非是新瓶装旧酒。

即使是提出经济绝交之后，抵制日货与经济绝交两个概念也常常混用或并用，其中原因，一是经济绝交运动的宣传者认为，宣传办法所用名词，务求明白浅近，之所以用“抵制日货会”而不用“经济绝交会”，是因为抵制日货四字，易为一般民众了解认识，“在宣传上便利许许多多”^①。二是经济绝交中的诸多措施，实际施行困难重重。如近人蒋默掀则认为，“中国今日对日经济绝交，在理论上所谓：不贩卖日货；不为日工厂做工；不接济日人粮食；不雇用日人及不雇于日人；不乘日人之轮船火车；不与日人有任何性质贸易（如医院、照相馆、娱乐场、饮食店等）；不入日本在华学习肄业；不使用日钞票及与日人断绝金融关系等，好像是以经济绝交为全部施行国家政策之工具；而在选择上也应该以经济绝交为全部施行国家政策之工具。然而在事实上，中国对日经济绝交之实施范畴，勿论故去与现在，不过限于抵货而已。”^②1933 年，金平欧在《对日决争之认识与策动》中也指出，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中国因为国防无准备而不能实行军事抵抗，不得不以经济作武器来抵抗，而所谓经济抵抗，亦仅是消极的经济绝交，就是消极的经济绝交，亦只能抵制日货，谈抵制日货亦尚不能彻底^③。

抵制日货、经济抵制、经济绝交、抵货、排货等名称，无论是在近人的宣传性文本还是研究性文本中，均未予以严格区分。即使是在今人的研究中，也是诸种称谓混用或并用。因此，本研究基本上采用抵制日货运动这一名称，或者简称为抵货运动，而在运用文献资料时，则并未强行统一，而是各种说法并用。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尽管 1937 年之前，国人主要限于抵制日货的范围，但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不论在宣传上还是实际行动中，则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经济绝交。故而，在讨论 1937 年以前抵货运动的经济效果时，仅考察日货进口这一方面，对中国出口所受影响未予讨论，而讨论抗战时期经济绝交的效果时，则对进、出口予以兼顾。

2、时段选择

除了当下偶尔发生的抵制日货运动之外，建国前后亦有抵货事件发生。1947 年 6 月 9 日，美国出于其全球战略利益的考虑而单方面宣布开放对日贸易。此举在中国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尽管中国社会各界大多激烈反对，而国民政府仍然采取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宣布开放中日之间的私人贸易^④。1948 年 6 月，福州学生决定组织抵制日货运动，一致抗议美国

^① 中国国民党河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编：《五三血迹》（4），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编第 30 辑，文海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71 页。

^② 蒋默掀：《抵制日货之具体化与其影响》，《时事月报》，1931 年第 12 期。

^③ 金平欧：《对日决争之认识与策动》，南京拔提书店 1933 年版，第 50 页。

^④ 其时，中日两国关系远未正常化，而且日本完全在美国的控制和操纵之下，并非一个合法的主权国家，中国国民政府在经济上对美国的依赖程度相当深，这种情况下开放对日贸易，引起各方疑虑和反对，是毫不奇怪的。当然，也并非所有的人都对开放日本贸易持反对态度，个别行业如摄影业即认为中日贸易的开放对其本身是有利的，也有部分商人认为中日贸易的开放将为其提供图利的机会。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

“复活日本黠武主义的政策”^①。同年7月，在变本加厉的日货倾销威胁之下，国统区各地商界陆续掀起抵制日货运动，重庆、成都两地商会拟成立“抵制日货委员会”，海口商会针对日货大量走私的现象发动对日货的抵制，广州商会亦通电反对日货倾销^②。值得注意的是，1958年5月，由于日本岸信介政府推行敌视中国政策，中国政府决定停止对日贸易，正在举行的广交会停止了与日商的谈判，并宣布已签进出口合同亦不再履约^③。

本研究之所以没有将建国前后的抵货事件纳入考察范围，而是将研究时段确定为1908至1945年，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一是这些抵货事件基本上没有形成规模，影响甚微，很难视为抵货“运动”。二是这些抵货事件的性质与本研究的考察对象并不完全一致。建国前后的抵货事件，基本上属于中国政府对日贸易政策的范畴，与此前频繁发生的反对日本侵略的民众抵货运动差别较大。三是两者发生的时代背景也不一样。1945年之前的抵货运动，尽管具体导因颇有不同，但都是源于日本的侵华政策。而随着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尽管国力仍然孱弱，但中国政府基本上可以自主制订对日贸易政策。

四、相关说明

1、立论基础

既有研究成果在解释模式上，大致存在民族主义和经济理性的分野。前者往往认为抵货运动既然是爱国运动，理当全民举动参与，否则便是缺失民族主义情感，便是不爱国。后者则将所有国民视为经济理性人，在抵货运动中时时进行成本与收益的衡量，全无爱国与不爱国之分。本课题研究试图以民族主义与经济理性相结合的解释模式，认为抵货运动的兴起主要源于民族主义这一思想资源，抵货运动的衰止则更多地在于经济理性，并且将民族主义与经济理性之间的一致和冲突作为理解抵货运动兴衰的根源。

2、研究方法

(1) 定性研究

运用理性选择理论分析政府和党派对抵货运动的策略；运用建构主义理论考察日本朝野对中国抵货运动的因应之道；运用经济学家奥尔森等人的集体行动理论解读抵货运动参与群体之间的合作与冲突；运用社会学家西美尔、桑巴特和制度主义先驱凡勃伦等人的社会时尚理论，探究民众消费观念对抵货运动经济效果的制约。

(2) 定量研究：

的，有立场的不同，也有认识上的差异，但无论如何，持赞同态度者毕竟是零星的、个别的从总体上看，中国民众对于这一涉及中华民族重要利益的事件是明确反对的。参见左双文、朱怀远：《战后初期开放对日贸易问题上的中国政府与民众》，《学术研究》，2008年第4期。

^① 《福州学生决定抵制日货》，《人民日报》，1948年6月16日。

^② 《掀起爱国自救运动，蒋区商界抵制日货》，《人民日报》，1948年7月18日。

^③ 此次中日贸易中断，责任完全在日本政府，但在客观上给双方造成损失，不利于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随后，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有效修补这些负面影响，并为中日贸易的恢复创造条件。参见欧阳湘、李光和：《从广交会看中国一九五八年停止对日贸易事件》，《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5期。

运用计量法、图表法研究抵货运动的经济影响。

(3) 比较研究:

运用比较法研究群体差异性和地域不平衡性等问题。

3、基本思路

本课题从集体行动的困境这一全新角度,综合运用多学科的前沿理论与方法,重审抵制日货运动实际效果与预期目标之间的差距,从经济水平、运动内理、社会观念、政治环境等方面,多角度、全方位揭示制约抵货运动效果的重重困境。

4、框架结构

该成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民族情感与经济理性的交互视角出发,对1908至1945年历次抵货运动的效果及其困境作了较为详尽和系统的研究。该成果除导论和结论外,由相互具有逻辑递进关系的两大部分构成。

导论部分在简要回顾前人研究之后,对抵货运动进行了必要的界定,对研究时段的选取理由、立论基础、研究方法、框架结构以及采用资料作了扼要说明。

第一部分,即第一章,理想与现实:抵货运动的效力。根据具体目标的差异,将抵货运动分为事后报复、外交后盾、制止军事侵略以及经济战争四大类型,并将历次抵货运动的具体目标与最终结果进行对照,考察抵货运动目标的实现程度。个案性考察与长时段审视相结合,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分析抵货运动对日货进口和在华经济势力的具体影响,从而论证抵货这一武器的经济效力。

第二部分,包括第2-7章,逐一分析制约抵货运动效力的诸种困境,系该研究的核心部分。第2章为抵无可抵:抵货运动的经济困境。以抵制日纱、煤、纸以及金融为例,探讨在中日经济联系紧密的背景下,抵制日货给中国工商两业以及民众生活造成的深刻影响,由此进而指出,受制于进口替代工业不发达,抵货运动只能选择有限抵制和短暂抵制。同时也为理解商人的消极态度以及抗战时期经济战中国处于下风提供基础。

第3章为激进与保守:各界群像及其冲突。在梳理学生、工人、商人参与抵货运动具体方式的基础上,指出群体之间尤其是学生和商人之间激进与保守互见,从而发生口角之争、武力冲突、罢市风波甚至炸弹威胁。而为了继续推进抵货运动,抵货积极分子往往只能降低其力度和烈度。

第4章为国分南北:抵货运动的地域差异。根据当时常见的方式,将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中和华南四大区域,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考察历次抵货运动的地域差异性,并分析地域差异对抵货运动经济效力的影响。

第5章为摩登与爱国:崇洋风尚与抵货运动。借鉴社会学关于时尚问题的理论,从社会崇洋观念的生成与传播入手,揭示抵货运动中民族主义与崇洋观念之间的紧张关系,探讨抵货运动经济效力充分发挥的观念性障碍。

第6章为强势应对:日本朝野与中国抵货运动。分别梳理了日本政府和民众对中国抵货运动的种种因应方式,并对日本朝野的上下一致和彼此互动进行了细致讨论,从而揭示日本

的反抵制措施对中国抵货运动的强大制约。

最后一章为国权与私利：党政力量与抵货兴衰。主旨在于考察中国政府与抵货运动兴衰之间的历史关联、抗战时期官方严禁与违禁的双重特征。该研究不赞成将镇压和破坏作为历届政府对待抵货运动唯一反应的观点，而是将政府策略的选取置于一个动态的而非静态的过程中进行考察和诠释。在引入日方压力、社会秩序和在野势力等各种变量之后，试图对中国政府对待抵货运动的策略给予同情和理解。

5、资料说明

关于抵制日货运动问题，目前尚无系统全面的资料整理和出版，有关史料极其分散。由于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一度受到高度重视，因此五四抵货和五卅抵货资料相对比较。课题组成员在全面检索本地图书档案资料的基础上，多次赴外地查阅资料，同时也得到诸多学界同仁的慷慨相助。另外，课题组充分利用了近代报刊资料，研究中涉及和征引的民国报刊多达100余种，同时也充分利用既有的诸多资料汇编。另外，本课题研究利用的英、日文文献亦多达数十种，既有民国时期出版的部分英文资料，也包括近期海外的英文研究文献。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尽管课题组成员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由于未能熟谙日语，故而本研究中虽然参阅了不少日文文献，但显然远远不够。这也是本研究最大的不足之一。

最后，还必须说明的是，自本课题2008年获批立项之后，关于抵制洋货问题的研究，海内外不断有新成果推出。此种现象，从一侧面印证了本课题研究的重要性。课题组对相关最新成果尽可能地予以关照和吸纳，但仍然难免挂一漏万。同时，尽管由项目主持人对各章节进行统筹规划和文字处理，但肯定存在行文风格不尽一致、论述不够周延、说理不够透彻等诸多不足，恳请大家批评指正。